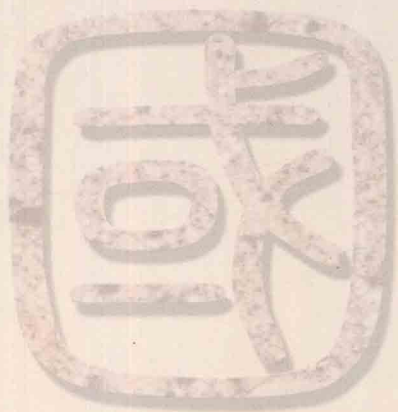


厦门大学国学院资助出版丛书

○ 之三十一

朱熹口语文献语言通考之四
李无未 李如龙 主编



朱熹口语文献修辞研究

叶玉英 著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出版丛书 ◎ 之三十

朱熹口语文献语言通考之四

李无未 李如龙 主编

朱熹口语文献修辞研究

叶玉英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熹口语文献修辞研究/叶玉英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1. 4
(朱熹口语文献语言通考; 4)

ISBN 978-7-5615-3910-1

I. ①朱… II. ①叶… III. ①朱熹(1130~1200)-口语-修辞-研究
IV. ①H1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5488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 @ public. xm. fj. cn](mailto:xmup@public.xm.fj.cn)

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9×1240 1/32 印张:9.25 插页:2

字数:250 千字 印数:1~2 000 册

定价: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序 言

近30年来,学术界对朱熹口语文献语言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黎新第《从量变看朱熹反切中的全浊清化》(《语言研究》1999.1)、刘晓南《朱熹与闽方言》(《方言》2001.1)、《论朱熹诗骚叶音的语音根据及其价值》(《古汉语研究》2003.4)等;训诂的如:陈松长《朱熹《诗集传》的训诂特色》(《古汉语研究》1989.3);语法的如:祝敏彻《朱子语类句法研究》(1991)、李思明《朱子语类的处置式》(《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4.1)、刁晏斌《朱子语类中几种特殊的“被”字句》(《古汉语研究》1995.3)、杨永龙《朱子语类完成体研究》(2001)、唐贤清《朱子语类副词研究》(2003 博士论文)等。

朱熹口语文献语言研究课题的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和理论意义:

(一)朱熹口语语言是宋代语言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之为窗口,可以窥见宋代口语的一些基本面貌。从某种意义上说,朱熹口语语言能够代表宋代通行口语的一些基本特点,把握住朱熹口语语言也就把握住宋代通行口语的实际。同时,也为宋代南方一些方言,比如闽方言研究提供确切证据。

(二)从整个汉语史的发展来看,朱熹所处的南宋正是汉语变化纷繁复杂的时代,有人认为是近代汉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完成时段。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南宋汉语的研究还远远没有达到深入、全面的地步,因而我们对南宋汉语的了解也十分有限,出于研究南宋汉语的需要,同时,也是研究近代汉语的需要,我们必须全面研究朱熹口语文献语言,它对研究近代汉语意义十分重大。

(三)采用比较成型的语言研究理论与方法,辅之以穷尽式的手段处理朱熹口语文献语言,一定能够开拓出切实可行的汉语史研究新思路,就汉语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探索来说,也是必须的,必将对科学的汉语史研究理论建设有所裨益。

(四)已有的朱熹口语文献语言研究成果,无疑是我们工作的基础,但其结论的正确与否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检验。本课题不但可以验证已有成果一些结论的正确性,而且还会对已有成果的一些结论进行修订与补充,甚至有所发展,这本身就是对朱熹口语文献语言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

本课题推出的四种研究成果内容涵盖了朱熹口语文献语言所涉及的基本范围,它们包括:一是朱熹口语文献词汇。包括朱熹口语文献词汇个性特征、朱熹口语文献词汇构成、朱熹口语文献新词新语、朱熹口语文献词汇与通语、方言等。二是朱熹口语文献语法。包括朱熹口语文献词法、朱熹口语文献句法、朱熹口语文献句式、朱熹口语文献语用特征等。三是朱熹口语文献语音,主要是朱熹《仪礼经传通解》语音。包括朱熹口语文献语音声母、朱熹口语文献语音韵母、朱熹口语文献语音声调、朱熹口语文献语音的个性特征、朱熹口语文献语音的方言基础等。四是朱熹口语文献修辞。包括朱熹口语文献修辞辞格、朱熹口语文献修辞语用、朱熹口语文献修辞技巧、朱熹口语文献修辞理论等。可以说,基本上囊括了朱熹口语文献语言的几个重要领域。

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一)由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和国内著名学者专家在1994年启动的新编《朱子全集》已经完成。课题组以之为基础,再行进一步广泛收集与鉴别朱熹口语文献,搞好朱熹口语文献分类汇编工作。

(二)就目前来看,新编《朱子全集》超越前人、质量一流,但它还是有一些缺憾,比如,它力图选择最好的版本为底本,博采他

本,精心校勘,但是,有些版本的选择不当,错误仍然不少,课题组必须对它重新进行校勘。这就要求研究者认真负责,把好文字关口。

(三)课题组对汇编好的朱熹口语文献各个类别,分别进行计算机处理,然后,将处理的数据进行整理与输出。

(四)对已经处理的朱熹口语文献数据分门别类加以研究,形成专题性的内容。这些内容,分开来是富于特色的独立性学术论著,而合在一起则是一个整体性的系列性著作。

(五)对朱熹口语文献语言研究史料的处理则是分为两部分进行,一部分是国内朱熹口语文献语言研究史料,也是按时间顺序加以参考,融入到专题论著中进行论述,重在突出各个时期学者们的贡献以及历史局限性;另一部分是国外朱熹口语文献语言研究史料,也是以国别,以及时间顺序加以参考并融入到专题论著中进行论述,重在突出各国学者们的贡献以及历史局限性。

我们认为,本课题突破的难题以及创新点是:

(一)突破的难题

1. 朱熹口语文献语言的鉴别。有一些文献口语特性比较明显,比如《朱子语类》,而有的就是文白夹杂,需要剔除文言成分,这是一项比较难以把握的工作,需要制订相应的标准加以区辨,这就突破了原来的一些学者的做法。

2. 朱熹口语文献词汇中的新词新语的确认。学术界对南宋出现的新词新语研究还很薄弱,由此,缺乏横向比较的参照,这就给朱熹口语词汇文献中新词新语的确认带来一些困难,如果能够突破这个局限,则会显现更大的研究生机。

3. 避免朱熹口语文献语音研究方法的单一性。以往研究朱熹口语文献语音,方法的单一导致结论的简单化。本研究注意方法的多样性,就能够从多方面验证结论的正确与否。比如反切,系联法与剥离法、统计法、内部分析法综合运用,则使材料的处理

更加科学合理。此外,语音材料的选择不拘于《诗集传》反切,而是扩大范围,引入《仪礼经传通解》语音材料,这肯定突破以往的研究视野。

4. 朱熹口语文献语言的方言特性认识。以往的研究多从宋代通语的角度认识,忽略了朱熹口语文献语言的区域性质,这就降低了朱熹口语文献的学术价值,用历史比较方法看待朱熹口语文献语言,寻找其方言特性,就会充分显示朱熹口语文献语言潜在的方言要素,难度虽然很大,但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收获。

5. 朱熹口语文献语言的语法特性,虽然有一些学者关注,但因为取材和方法的局限,所得出的结论并不为人们所认可,其原因在于量化描写和深层次解释不够,我们在这方面用力甚勤,并取得了一些令人满意的效果,突破原有的语法研究思维模式是肯定的。

(二)创新点

1. 整体性观念。第一次大规模系统整理与研究朱熹口语文献语言,这本身就是一个创新,是过去那种“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式研究所无可比拟的。

2. 对朱熹口语文献各个语言要素分门别类进行研究,然后,又要找出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寻求语言的平衡规律,角度是新颖的。

3. 视野不局限于国内学者的研究,而是扩大到国外,这在朱熹口语文献语言研究史上也是一个比较新的视野,顺应的是朱熹口语文献语言学术研究国际化的大势。

4. 朱熹口语文献语言中蕴涵了许多语言教育和修辞的内容,过去也不为人们所注意,本研究课题在这方面有所建树,肯定是提升了朱熹口语文献语言的价值。

需要说明的是,本丛书四种的顺利完成,首先要感谢每一种书的著者。他们是: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李焱博士、厦门大学

中文系叶玉英博士、厦门大学中文系陈明娥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李红博士。他们分别毕业于著名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在读博硕士期间,都受到了知名教授,比如李如龙、刘钊等严格的汉语语言学和文献学训练。博士毕业后,继续钻研,结合教学思考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逐渐形成了各自的研究特色,并在各自领域渐露头角,并据有一席之地。此次集合在朱熹口语文献语言研究的课题之下,发挥各自学术专长,为课题研究付出了大量心血,相互协调,默契配合,出色地完成了所分担的子课题任务。我们看到,各部著作所体现的创新性,充分表现了他们的学术潜力和智慧,他们都具有深厚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这使我们对本书的质量保障坚信不疑。通过实施本课题研究,我们团结了这批实力雄厚的新生力量,凝结成了一个富有厦门大学特色的朱熹口语文献语言研究团队,他们不负众望,不畏艰难,艰苦奋斗,具有宽厚乐观的性格,其耐人寻味之处,可圈可点,他们这种为学术而献身的敬业精神实在是突出的,更是让人可钦可敬。

其次,我们要感谢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原院长、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支平教授。陈支平教授是著名的中国古代史学家,同时也是中国古典文献学家。他以自己敏锐的学术洞察力,认准本课题设计的学术前瞻性和创新性,不遗余力地支持在厦门大学国学院立项。一晃三年多时间过去,本课题如期顺利完成,事实证明了她的判断是正确的。

“朱熹口语文献语言通考”是朱子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人与李如龙教授合作策划这项课题,由来已久。我们的初衷是,以富于特色课题带动科研,以大课题培养新生力量,以便保持厦门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的前沿性学术地位不变。朱熹是中国儒学精神的象征,同时也是闽学的奠基人。他所遗留下来的大量文献,有“宋代百科全书”之誉,是我们今天学人取之不竭的宝贵精

神财富。而作为身处福建的厦门大学学人,有义务继续挖掘它的重大学术价值,并对他的学术精神有所发扬光大。由此,朱熹口语文献语言研究课题成为我们的首选。在这一点上我们两人的思考不谋而合,也就成为我们此次携手合作的前提和契合点。李如龙教授是海内外公认的汉语方言学研究大家,但他的研究领域不拘于汉语方言学,汉语语言学史、汉语史、海内外汉语教育理论等领域也是成就显著,由他指导实施本课题研究,就使得本课题研究的深度和创新度得到了有效保证。

本人与李如龙教授的分工如下:李如龙教授牵头负责《〈朱子语类〉语法研究》与《朱熹口语文献词汇研究》的审订;本人牵头负责《朱熹〈仪礼经传通解〉语音研究》与《朱熹口语文献修辞研究》的审订。具体统稿时,相互交换看法,斟酌各方面意见而确定内容和体例。

本课题研究推出四种著作,我们期待着海内外同行学人予以关注和批评!

李无未

2011年2月21日

于日本东京八王子丹木町创价大学寓所

目 录

序 言

绪 论	(1)
一、朱熹生平及学术思想简介	(1)
二、朱熹的语言文学造诣	(2)
三、朱熹口语文献语言的修辞学意义	(12)
四、朱熹口语文献语言的修辞观	(13)
第一章 朱熹的思想理念传意策略	(26)
一、近取诸身 远取诸物	(26)
二、逻辑严密 层层分明	(34)
三、化无形为有形 解抽象为具象	(35)
四、信手拈来 就地取材	(37)
五、说古道今 列举事例	(39)
六、引经据典 巧用典故	(41)
七、方言俗谚 平易自然	(43)
八、说文解字 参透义理	(60)
九、巧用譬喻 一物多用	(63)
十、生活琐事 点石成金	(85)
十一、举手投足 谈笑自如	(88)
第二章 朱熹的教育传意策略	(98)
一、明确以接受者为修辞主体	(99)

二、朱熹的表达策略	(108)
第三章 朱熹口语文献语言的语音修辞	(130)
一、语言节律的运用及其修辞效果	(130)
二、平仄与押韵的修辞效果	(133)
三、声训的修辞效果	(137)
四、叠音词的修辞效果	(141)
五、双声叠韵的运用	(160)
第四章 朱熹口语文献语言的词汇修辞	(167)
一、巧用副词	(167)
二、名词、动词、形容词的转品	(173)
三、词尾的修辞效果	(180)
四、仿词修辞	(195)
五、同义修辞	(201)
第五章 朱熹口语文献语言的句法修辞	(208)
一、对偶	(208)
二、层递	(216)
三、顶真	(220)
四、回环	(221)
五、排比	(225)
六、反复	(232)
七、错综	(238)
第六章 朱熹口语文献语言的其他修辞策略	(243)
一、比喻	(243)
二、比拟	(265)
三、夸张	(268)
四、拈连	(272)
五、摹状	(274)
结 论	(281)
参考文献	(284)

绪 论

一、朱熹生平及学术思想简介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考亭。徽州(今安徽歙县)婺源(今江西婺源)人,侨寓福建建阳,南宋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哲学思想,在宋末到清代700年中,都占有统治地位,成为几个封建王朝的官方哲学。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朱熹生于福建尤溪。在他的一生中,除在浙江、江西、湖南、安徽逗留三年多外,其余都在福建各地学习、著述、讲学、从政,晚年定居在建阳县的考亭,且卒于考亭。因此朱熹被称为建阳人或考亭人,其学说被称为闽学或考亭学派。朱熹从学于北宋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在朱熹的哲学体系中,“理”、“气”、“性”和“心”是其核心范畴,以此为基础,朱熹提出了理气论、心性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人心与道心的关系等一整套理论体系;从世界观说,朱熹认为宇宙的最高存在或本体就是太极,整个世界万物都是太极产生的。朱熹的这些基本观点,追溯源流,他的太极说来自周敦颐,他的理一元论来自二程,他又吸收了张载关于气的某些观点,并将气表面上列在与理同等地位;从认识论说,他继承了程颐格物穷理的思想,认为:“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补大学格物传》)他所谓的格物是指“或考之事为之著,或察之念虑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大学或问》)他所谓的

穷理,就是“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己,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大学或问》)

朱熹 24 岁任同安主簿时就经常有青年跟随其学习。50 岁复建白鹿洞书院,常与学生探讨疑问,并勤于教书育人。54 岁时,于福建崇安武夷山武夷精舍,许多求学之士皆来听学。后建“竹林精舍”,聚徒讲学。61 岁刊印《四经四子书》,经常到学,对诸学生循循善诱。66 岁知潭州,修复岳麓书院,白天忙于治理郡事,夜则与诸生讲论,随问而答,略无倦色。后回到建阳考亭,修建沧洲精舍,表示“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洲”,跟随他的学者达数百人之多。这些门人分别属于福建、浙江、江西、湖南、安徽、江苏、四川、湖北、广东、河南、山西等地,可谓来自全国各地,从而朱子学流传于全国,后来形成不同的朱子学系,如福建系、浙江系、江西系等。

二、朱熹的语言文学造诣



(一)朱熹的诗论

朱熹是理学家,同时又是诗人、古文家、文学评论家。朱子酷爱诗歌,“少喜作诗”(岳珂《桯史》卷一三《晦庵感兴诗》)。陈衍说:“晦翁登山临水,处处有诗,盖道学中之最活泼者”(《宋诗精华录》卷三)。朱熹一生作了不少诗,流传下来的就有一千余首。后人读他的诗,得到的印象是“中和条贯”、“无事模铸”(《宋诗钞·文公集钞》)。胡应麟称“大抵南宋古体当推朱元晦”(《诗薮》杂编卷五)。今人钱锺书至推朱子为“道学家中的大诗人”(《宋诗选注》刘子翬短论)。^①

作为一位理学家,朱熹的诗学也是以理学思想来统辖、规范、制约诗学思想的。这不仅表现在诗歌创造,还包括诗歌欣赏、批评以及

^① 参见刘永翔《朱子诗文略论》,《〈朱子全书〉与朱子学——2003 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62~66 页。

对诗歌本源、特征、功用的探讨和诗人修养等方面,其核心和根本则在于其理学本体论,即以理气观为中心的理本论。这种本体论的影响表现在艺术创作和修养的关系上,就是强调人品与文品、作文与穷理的统一。朱熹的理气观落实在诗学上,则表现为志就是理,诗就是气,将传统的“诗言志”理论中的“志”作了性理的阐释。因此他强调诗歌要“吟咏性情之正”,要“思无邪”。朱熹主张心性论则是他的诗不同于别的道学家根本原因。他认为心兼性情,性为心之体,情为心之用,已发之情是无法灭掉的。他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所以作也。”(《诗集传》自序)不过,他还是反对过分的情感抒写,认为只有达到中和才是理想的诗歌境界。^①

朱熹还曾对上古至宋的诗史作过通盘的考察,因此他对诗歌鉴赏,对诗歌本源和功用,对诗人的修养等问题都能一语中的,切中要害。如他在《诗集传》中对赋、比、兴的论述:“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释义简洁精当,一直受后人关注;又如他在诗歌鉴赏方面提出不少值得我们重视的意见。他批判齐梁诗浮薄,“读之使人四肢皆懒慢不收拾”;他说“古诗须看西晋以前,如乐府诸作皆佳”、“李太白(李白)终始学选诗,所以好。杜子美(杜甫)诗好者亦多是效选诗,渐放手,夔州诸诗则不然也”,主张学诗从《文选》入手,又说“作诗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经。本既立,次第方可看苏黄以次诸家诗”。批评今人“作诗不学六朝,又不学李杜,只学那峣崎底”;他指出:“诗须是平易不费力,句法混成。如唐人玉川子(卢仝)辈句语虽险怪,意思亦自有混成气象。因举陆务观(陆游)诗:‘春寒催唤客尝酒,夜静卧听儿读书。’不费力”,批评今人作诗,“苏才豪,然一滚说尽,无余意;黄

^① 参见石明庆《论朱熹理学与诗学之关系》,《朱子学刊》2005年第1辑,合肥:黄山书社,2005年,第15~28页。

费安排”，“古人诗中有句，今人诗更无句，只是一直说将去”；他称赞杨亿（大年）诗“虽巧。然巧之中犹有混成底意思，便巧得来不觉”，批评今人“不识这意思，只要嵌字，使难字，便云好”；他欣赏鲍照（明远）“才健”、“语又俊健”，谢朓诗“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苍然”十字“却有力”，陶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唐明皇诗《早渡蒲津关》“多少飘逸气概！便有帝王底气焰”，李白诗“不专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缓底”、“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也”，杜诗“初年甚精细，晚年横逆不可当”，韦应物（苏州）诗“高于王维孟浩然诸人，以其无声色臭味也”，石延年（曼卿）诗“极雄豪，而缜密方严”，黄庭坚（山谷）诗“精绝，可谓巧好无余，自成一家”，韩诗平易，老苏下笔“雄健”，刘淮（叔通）“放体不拘束底诗好”，江文卿“有格律入规矩底诗好”，赵蕃（昌父）“较恳恻”，斯远（徐文卿）诗文“虽小，毕竟清”。他批评李贺诗“巧，较怪得些子，不如太伯自在”，张耒（文潜）诗“有好底多，但颇率尔，多重用字”，梅尧臣（圣俞）诗“不好底多。如河豚诗，当时诸公说道恁地好，据某看来，只似个上门骂人底诗；只似脱了衣裳，上人门骂人父一般，初无深远底意思”，方士繇（伯谟）诗“不及其父钱监公豪壮”，黄铢（子厚）诗“老硬，只是太枯淡”。这是对历代诗人个性风格的褒贬。

朱熹特别注重诗人修养与诗的关系。如韦苏州诗“无一字做作，直是自在，其气象近道”，是因为韦“为人高洁，鲜食寡欲。所至之处，扫地焚香，闭合而坐”，与陶渊明相比，陶“却是有力，但语健而意闲”，这是因为“隐者多是带气负性之人之为之。陶欲有为而不能者也，又好名”；白居易，人多说其清高，其实爱官职，这从他的诗中“凡及富贵处，皆说得津津地涎出”可见；今无一人做得成好诗，是因为“心里闹，不虚静”之故。



（二）朱熹的文论

朱子文章更为南宋一作手。清人洪亮吉极为看重朱熹之文，称

朱熹与陆游分别是南宋诗与文之重镇：“南宋之文，朱仲晦大家也；南宋之诗，陆务观大家也。”（《江北诗话》）^①李慈铭对朱熹的文章也颇为欣赏，说其文“明净晓畅，文从字顺，而有从容自适之致，无道学家迂腐拖沓习气。”（《越缦堂读书记》）李涂在《文章精义》中说“晦庵（朱熹）先生诸文字，如长江大河，滔滔汨汨。”朱熹的文章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一方面是因为他作文总是能高屋建瓴，牢牢把握义理，所言所论，无不由此生发开来，如同为天立心，代圣人立言，这样便是站在高处、坐在平处、行在阔处，立论颇占地步而“其锋不可犯”；另一方面得益于他早年的学习。朱子于古文也是下过苦功的，自言“自少喜读韩文”（《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三《跋方季申所校韩文》），又言“余年二十许时，便喜读南丰先生之文而窃效之。”（《文集》卷八四《跋曾南丰帖》）。他极为推崇曾巩（南丰）的文章，称赞南丰“文字确实”、“又更峻洁”、“文却近质”、“议论平正，耐点检”、“亦说得透”。他还强调“人要会作文章，须取一本西汉文，与韩文、欧阳文、南丰文”，宜以“欧曾文字为正”，因为“考欧曾遗法，料简刮摩，使其清明峻杰之中自有雍容俯仰之态，则其传当愈远而使人愈无遗憾矣”（《文集》卷六四《答巩仲至》）。不过，他虽韩、欧、曾并学，但写出来的文字却近曾而不近韩，亦乏欧文一唱三叹之致。闵泽平先生对朱熹文章风格作了较为细致的研究。他认为朱熹之文总体特色是从容、平和。^②朱熹推崇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说而意自长”，故其文语出胸臆，娓娓道来，如风行水上，略无滞碍，不费安排，毫无峭折流丽之习。朱熹行文简易而意气凛然，不动声色而林茂深严，使人难以辩驳。正如李光地所说的：“朱子文字，何尝能到马、班、韩、柳，但理足，便觉得任他才学笔力驰骋藻耀，都压他不下。”而且“一句有一句事理，即迭

① 洪亮吉《江北诗话》卷三，陈迥冬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② 闵泽平《朱熹文章风格论略》，《朱子学刊》第1辑，合肥：黄山书社，2005年，第29～47页。

下数语，皆有迭下数语着落，一字不肯落空。”（《榕村续语录》卷一九）即使是学术色彩很浓的序文，朱熹也能写得言约意丰，往往寥寥数语，便将思想演变的脉络或版本流传的经过勾勒出来。用语质朴，语气平和，旨意显豁，以识见美取胜。在书信中，朱熹也能将“情挚”与“语顺”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既充分传达出自己的内心感悟，又不失之于豪宕、放纵、悍厉，如山之出云、水之赴壑，虽千变万态，莫不是自然而然，无丝毫牵强迁合。闵泽平先生认为朱熹行文的从容、平和，既来自他的自信，也得力于他的说理周详、条分缕析以及论述的充分与透彻，其源泉则来自他的哲理涵养、对经籍的谙熟、对社会生活的密切关注以及对现实问题的深刻探讨。^①

正因为朱熹视从容、平和为文章之最高境界，因此他主张“文章须正大，须教天下后世见之，明白无疑”，从而做到“平说而意自长”。《楚辞》、《史记》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他说“《楚辞》平易，后人学做者反艰深了，都不可晓”，“《楚辞》想只是信口恁地说，皆自成文。林艾轩（林光朝）尝云：‘班固、扬雄以下，皆是做文字。已前如司马迁、司马相如等，只是恁地说出’，今看来是如此……当时如苏秦、张仪，都是会说。《史记》所载，想皆是当时说出”；他评价欧阳修文“如宾主相见，平心定气，说好话相似”，批评苏轼（东坡）文“如说不办后，对人闹相似，都无恁地安详”；他称赞张九成（子韶）文字“沛然犹有气，开口见心，索性说出，使人皆知”，韩元吉（无咎）文“做著尽和平，有中原之旧，无南方啁哳之音”。朱熹认为作文当有平常之心，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有条理。“据某意，只将那事说得条达，便是文章”，“作文何必苦留意？又不可太颓塌，只略教整齐足矣”。

朱熹论文，力主用字平易。他说：“欧苏全不使一个难字，而文章如此好”、“李泰伯文亦明白好看”，“大率古人文章皆是行正路，后来杜撰底皆是行狭隘邪路去了。而今只是依正底路脉做将去，少间文

^① 闵泽平《朱熹文章风格论略》，《朱子学刊》第1辑，合肥：黄山书社，2005年，第29～47页。